

事是风云人是月

王充闾读史

王充闾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下卷
宋至晚清

险棋·妙棋

“陈桥兵变”——赵匡胤一出道，首先就下了一着险棋。

公元950年，二十四岁的赵匡胤投到后汉枢密使、大军阀郭威的麾下，当上了一名普通士兵。郭威外号“郭雀儿”通过一场武装政变，登上了帝王宝座，成为后周的开国皇帝。这使赵匡胤这个颇有心计的小伙子，洞明了世情，大开了眼界，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从而在躁动的心灵里，暗自萌发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狂妄意念。四年后，郭威病死，由其养子柴荣继位，史称周世宗。赵匡胤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担负着防守京师汴梁的重任。这样，他就以其豁达的心胸和高明的手腕，确立了在禁军中的统帅权威，博得了众将士的信赖。他自己更是有意识地培植私人势力，暗地里同石守信等几个禁军将领结拜为“十兄弟”。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病逝，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由他的母亲符太后掌握政权。翌年元旦，不明不白地传过来河北镇州、定州报警的讯息：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向后周发起进攻。慌急中，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等未及辨明真假，便派遣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去迎战。赵匡胤的军队刚一出动，汴京城内立刻传扬出“出军之日，当立点检做天子”的舆论。





正月初三晚上，大军行至汴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本来“救兵如救火”，火上眉梢刻不容缓，可是军队却破例地就地宿营，军帐就设在镇上的东岳庙里。当夜，军中部将在赵匡胤的胞弟赵匡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的策动下，集结于军帐之外，声言要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同时，将拥立、兵变事宜派人飞马驰报赵匡胤的亲信、重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警戒京师，里应外合。帐内的赵匡胤，装作酒醉未醒，慢腾腾地起床坐帐，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众将官一齐拥入厅堂，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然后一齐跪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今天看来，当时发动这场武装政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古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周世宗原是一位颇得民心与军心的英主，即使他不在了，靠着“遗泽”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而且，当时汴京城内，后周王朝还有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几个方镇的节度使也并未甘心顺从，直到赵匡胤称帝后，有的仍然拒绝受封，有的还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只是由于赵匡胤吸纳了当年郭威发动政变的成功经验，举事后，对于后周皇室实行了优待政策，尤其是对于前朝文武官员，一律照常信用，就连宰相府也还是原班人马，各就其位。这样，就最大限度地稳定了人心，减少了阻力。使得这场异姓称王、改朝换代的大变动得以比较平静、安稳地收场。

一场武装政变，竟然兵不血刃，甚至刀光剑影都没有见到，这在历史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魏晋以来盛行的“禅让”方式，也要比这个复杂得多、险恶得多。何况，它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兵变夺权活动呢。至于《三字经》里那句话：“炎宋兴，受周禅”，这并非历史的真实，显然是蓄意加以粉饰。原因是此书出自宋人王应麟之手，作为胜朝的文士，他又没有长着两个脑袋，怎敢不为尊者讳？

倒是赵匡胤自己，为了做给旁人看，在夺得帝位之后，又特意上演了一场“禅让”的把戏。颇像一对私通的男女，孩子已经出生了，再去补办一个婚姻登记手续，显得尤为可笑。

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皇权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做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

想，甚至可以说是事与愿违。

二

如果说陈桥兵变是一着险棋，那么，杯酒释兵权则是一着妙棋。

赵匡胤通过总结隋唐五代的经验教训，发现直接威胁皇权稳定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来自皇族自家，觊觎皇位的往往是那些强有力的龙子龙孙；二是藩镇割据势力；三是宦宦、母后、外戚；四是功臣、宿将、权贵。

在他看来，前三个方面当时尚未形成足以动摇皇权的威慑力量，最具危险性的是功臣、权贵，特别是那些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领兵将帅。一个武人，因缘际会，一夜之间就皇袍加身成了皇帝，像他这样并不是第一个，经眼的已经有四起了。几十年间就是这么过来的，军队要谁当皇帝，谁就能做。说来真是可怕！

那天，他就着这个问题同赵普交换看法。他说：“唐末以来，数十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八姓十二位君主。一些勋臣宿将不守本分，攘夺帝位，以致争战无休无止，百姓困苦不堪。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社稷长治久安呢？”这里充分反映出他积怀已久的心迹。应该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如何防止大宋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永保赵氏家族的世代传承。

赵普的答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武力对于政治的超强干预。藩镇权势太重，君弱臣强，弱指难以驱使强臂，这是那些短命王朝的症结所在。根治的办法就是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谷，这样，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

接着，赵普又进一步剖析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五代皇帝多由夺位而来。这些夺位者，大多是节度使，而且多是由禁军将帅升迁的。节度使与禁军构成了直接危害皇权的两大权势集团。周世宗已经发现了这种危机，曾对禁军与藩镇势力加以节制，但是未能改变其作为武将拥立、夺权的工具这个性质。说到这儿，他就把话题直接转换为劝说太祖尽快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掌握禁军的兵权。

太祖认为，赵普对形势的分析很准确，但提到的这几个人，可与其他将领不同，他们一向忠心耿耿，是绝不会背叛的。





赵普说：“我并不是说，陛下这些结义兄弟会背叛您，其实，他们也不具备统御万方的才力。但是，如果他们手下的人，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要改朝换代，实行拥立，他们也没有办法加以制止。”

这一番话可说到了太祖的心窝窝里，陈桥兵变的整个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连声说：“我懂了，我明白了。”他从自己据有天下的事实，认识到异己的军事力量可以对政治起支配作用，是对既得政权的最大威胁。他很怕那些手握重兵的人哪一天会“依样画葫芦”，再发动一场新的兵变。因此，对于身边一些共同举事的军事将领产生了强烈的疑忌心理，不能不时刻加以防范，于是下决心要收揽兵权。

一天，太祖以议事为名，把结义诸兄弟召集到一起。到齐后，每人发给一匹马，并一弓、一剑，然后避开一切随从人员，带领他们私出，来到郊外一处密林中畅饮。大家无拘无束，喝得十分痛快。突然，太祖起身，说道：“此处别无外人，你们中哪一个要想当皇帝，方便得很，只要动手把我干掉，便做成了。”诸将帅顿时吓得冷汗渗出，酒意全消，一齐跪下，伏地求饶。太祖稍稍缓和了口气，说：“看来，你们都是真心让我当皇帝了。”众兄弟赶忙齐呼“万岁”。最后，太祖说：“你辈既然拥护我为天下主，今后就要尽臣子忠君之节，不得无礼犯上。”实际上，这是一场“释兵权”的预演，也带有“打招呼”性质。

接着，趁慕容延钊与韩令坤二人出外巡边回京朝见的机会，解除了他们禁军主帅的兵权，安排到外地当节度使；并且，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不好下令罢免，便摆下了第二步棋：四个月後，太祖利用晚朝机会，请这些禁军宿将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屏退左右侍从，显得十分亲热地说：“如果没有众卿的拥戴，我是不会有今天的。然而，众卿又怎能知道，做皇帝也实在是太艰难了，远远赶不上当个节度使那样舒服。一天到晚都不能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听了，赶忙叩问缘由。他便接上说：“我是担心天下坐不安稳啊。皇帝的位置，人们都争着坐。虽然你们没有异心，可是部下贪心不足，总是希图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身，你们想要不干，能办得到吗？”

一席绵里藏针的话语，使这些将领觉察到自己已经深受疑忌，弄得不好将要招致杀身之祸。于是，纷纷泣谢叩头，说：“臣下愚昧，未曾想到这一点，唯有陛下哀怜，请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



太祖就势开导说：“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人们都希图富贵，想要多积攒些钱财，自寻快乐，使子孙免受困乏，常保康宁。你们这一辈子也够辛苦的了，何不解脱兵权，到外地去出守边镇，选择些良田美宅买下来，为子孙后代置下永久能够保有的产业，再多蓄一些歌姬舞女，日夕欢宴，乐享天年。朕还要同众卿结为姻亲，君臣之间，永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美好吗？”

听皇帝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就省悟了，便连连叩头谢恩，第二天就以健康情况不佳为由，请求免去掌管禁军的职务。太祖欣然同意，分别安置他们到外地任职，并给予很多的赏赐。唯有石守信兼任的职务如旧，但已不再握有兵权。事后，为了兑现酒席上的承诺，安抚这些失去兵权的禁军统帅，太祖果真下令在京城为他们建造豪华的宅第，给他们以足量的薪金；并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共同结为姻亲。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把那些勋臣宿将手中的实权顺利收回，使节度使变成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与优厚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封疆大吏。而那些百战疆场的领兵将帅，也已厌倦了长期的战乱与宫廷斗法，更乐得脱离政务、坐享清福、安富尊荣。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整个过程。历代削藩镇、夺兵权，都必然伴随着一场凶险、残酷的血腥搏斗，前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后有明初的“靖难之役”，至今，其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犹彰彰在人耳目。可是，宋太祖赵匡胤所进行的削藩、收权，却能以和平方式达到预期目的。对于功臣，疑忌则有，荼毒却无，经赵匡胤之手，几乎没有杀过一个功臣，而且，“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作为一项祖宗家法传承下来。因而，赵宋王朝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是残害大臣最少的朝代。后代史臣称赞“杯酒释兵权”是“识时势，善割断，英主之雄略”。看来，宋太祖确是走了一着妙棋。

三

当然，真理哪怕越过一步，也会成为谬误。如果说，前代帝王之失，多在于专恣、横暴；而宋太祖之失，则是防范过当、“惩羹吹齏”，以致丧失了抵抗能力。即以下面这些举措来说，有的可能利弊参半，有的则弊多利少，



甚至纯粹属于失误。

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太祖起用一批文臣担任知州职务，并在各州设置通判，使其权力与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长官权限，避免出现个人专权的弊端。地方上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权限，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在中央，对宰相实行分化事权、相互制约的办法，把军事行政权分出，划给枢密院；国家财政和地方贡赋划给三司。这样，宰相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的群体，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来个人。任何一个相职都不能独断军政大事。兵权上收之后，把原来由一个人掌握的权力分解为几部分，最后连战前作战方案的制订、战中现场的指挥都不能归属于同一个人。军权、政务一切全都听命于皇帝。

到了宋太宗当政，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防范将帅外出作战不听君命约束，实行“将从中御”的对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亲授机宜，交代事先拟好的“阵图”，大到战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带兵者都不得擅自加改变、自作主张。同时，还派遣宦官监军，部队一切动向随时都向皇帝禀报。实际上就是后来叶适所说的：“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使任何一个军事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势将面对层层难以跨越的障碍，因而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对作战的能力。且不说整个武装力量削减得弱不堪击，厢军更是从根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即以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制度、指挥体系来说，运转起来必然滞缓无比，还有什么效率可言呢？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北宋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



北宋之失

赵匡胤刚取得政权时，形势原本十分严峻，可是，奇怪的是，竟然作出“外患不足畏，内忧深可惧也”的判断，确定下“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方略，从而种下了后来的无穷祸患。

北宋立国时统治区域很小，只限于黄、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带，后来虽然有所拓展，整个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了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清朝的五分之一。当时，北方雄踞着先它五十余年立国的契丹，还有虎视眈眈的北汉；西面有日夕图谋东进的西夏；西南有坐险自大的后蜀；南面有吴越、南汉、南唐，占据着重要经济地区，割据称雄。

太祖、太宗两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而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惨遭失败，特别是高粱河之役，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就因伤死去。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京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开创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苟安的先河。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北宋覆亡，徽、钦二帝被俘获到五国城。总之，终北宋之世，固然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但是，外患频仍，兵连祸结，迄无宁岁。

本来，开基创业的封建皇帝，立国之初都是迷信武力的，像前代的秦始皇、汉高祖、唐高祖，后世的元太祖、明太祖、清太祖，可说无一例外。而



且，五代十国是武人的天下，赵匡胤正是在武人堆里混大的。奇怪的是，这位“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纵横捭阖、睥睨一世的旷代枭雄，得了天下之后，竟然惧武如虎、憎武如仇，说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细按史事，寻根溯源，却又觉得他之所以这样决策，也有其一定的根据。

赵匡胤出生于公元927年，其时正处在唐末五代干戈扰攘之际，当时，武将擅权篡位一起接着一起，社会上盛行重武轻文的风气。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骁勇善战、长于骑射的武将。生长在这样一个社会、家庭环境之中，自然养成这个“将门虎子”习武知兵、不畏强梁的性格。赵匡胤从小就练就一身精湛的武艺。有一次，他飞身跃上一匹没有戴上笼头的烈马，那马狂突乱跳不止，而后冲上了城墙斜道，将他从门框顶上撞将下来，观者都以为必将脑浆迸裂。不料，他却迅速站立起来，重新腾身上马，往复驰骋如初，使在场的人个个大感骇异，惊为神人。

五代的后汉有一位禁军统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于毛锥子（笔），顶什么用？”许多人都奉为至理。可是，赵匡胤却另有所见，大不以为然。尽管武力曾经帮助他完成了由普通一兵到禁军统帅直到位登九五的宏图伟业，但他并没有把武力神圣化、绝对化。他的观点，与前代帝王所达成共识的“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有些相似，但又进了一步。

本来，赵匡胤识字不多，而且半生戎马，是无暇专门研究学问的。可是，对于读书、治学他却一向极端重视，即使在行军途中，也是左经右史，手不释卷，一旦得知哪里有奇书异史，他会不惜重金购得。还在随周世宗征讨南唐时，曾有人向皇帝揭发赵匡胤掠夺了大量财宝，装了几车。世宗当即派人搜查，结果发现，除了几千卷图书，再没有其他财物。

太祖初登大宝，年号叫做“建隆”，四年之后，改为乾德。对于这个年号，他是很欣赏的，宰相赵普也跟着说好，还列举了许多实事，说明使用这个年号乃是圣上英明之举。不料，却遭到了翰林学士卢多逊的耻笑：“好倒是好。不过，四十几年前，前蜀王衍就曾用过这个年号，当然，时间很短，几个月过去便覆亡了。”太祖听了大吃一惊，赶忙找人去查对典籍，果然不错。怎么竟然弄出这么一个“晦气”的货色？当即又羞又恼，一口气没处出，就把赵普叫过来训斥一顿，叫他向卢多逊看齐，抓紧时间读书。最后，还留下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宰相要用读书人。”



这些，都为宋朝立国之初奉行“重文轻武”的统治方略提供了依据。

当然，宋初“重文轻武”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防备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夺权。

说是“轻武”，其实质恰恰是“重武”，也就是过于看重武力的作用了，以致言兵色变，带上了一种恐惧心理。这样一来，在确定治国方略时，就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思路，即抑制武力因素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超强干预，强调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最终达到维护专制皇权与王朝稳定发展的目的。

这样一来，便抛弃了以往依靠和培植军功阶层作为统治柱石的传统，而转向大量提拔、重用那些没有跋扈资本、也缺乏造反能力、又比较驯服听话的文人士大夫。随着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制度的确立与推行，特别是科举考试制成为培养忠君报国以及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要载体，军功贵族、豪强世家逐渐失去了发展的根基，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

《宋史》记载，太宗时代，功勋卓著、位居枢密使高官的大将曹彬，谨小慎微，“遇士（大）夫于途，必须引车避之”。而文官队伍的作用则日益提升，逐渐成为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论者以十五字概括之：“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赏赐厚，责罚轻。”

北宋时期，甚至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文人知州，文人入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可以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整个政坛到处都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蔡襄语）。结果就像宋人诗句所形容的：“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这固然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同样是巨大的。在整个宋代，“重文轻武”从最初统治者的一种政策、策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统治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以至后世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正当封建时代从前期向后期过渡的一个重要关口，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向，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其实，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太祖心目中，文人无足轻重，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任凭几个书生是翻不起大浪来的。《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现在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



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番话，极为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

宋代初年重文轻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所谓“守内虚外”。从宋太宗的论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底蕴。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应有的戒备和足够的认识。他同乃兄一样，平生所习闻惯见的，是晚唐、五代期间，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特别是武夫悍将长期主掌政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外敌入侵，攻城略地，蹂躏中原，生灵涂炭，却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北宋年间，军队分为禁军与厢军两种，相对而言，禁军战斗力较强一些；厢军，无论就数量和质量来看，都难以济事，他们的职责不是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调遣他们去做。所以，空有其名，只是摆设。对此，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唯命是从。这也正是太祖的用意所在。

由于养兵的目的只在于消极地防守，完全没有进攻的打算，因而，作为主要兵力的禁军，半数以上都布置在京师与内地的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长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为了防止“兵将相习”以致肇祸作乱，便不停地将大量兵员调来调去，而领兵的将帅却在原地不动，从而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的奇怪现象，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根本无从谈起。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

苏轼等有识之士看得就更透彻一些，明确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纨绔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在人们的心目中，士兵的形象也很糟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就是这时传出来的。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

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宋朝立国当时，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人，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那是后来的事），且以步兵为主。因为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东北蓟辽之野与西北甘凉河套一带两地出产，前者已为辽朝所有，后者沦于西夏。而辽朝的军队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主要都是骑兵。当时边防重点在于辽阔的北方，骑兵匮乏，就无所谓战斗力。双方力量对比，强弱甚是悬殊。史载，北宋与契丹的战事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除一次获胜外，其余都是连连败绩。翻开北宋的整个对外作战史，这种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记录，可说是连篇累牍。

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从订立“澶渊之盟”开始，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进贡白银三十万两——这个数字比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白银的总量都要多。与西夏作战，四年过去，死伤数万，只好屈辱求和，条件是每年“赏赐”对方白银五万两、绸缎十三万匹、茶叶两万斤。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做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从无字碑说起

一

“无字碑”的出现始于汉武帝，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它就屹立在东岳泰山的玉皇顶上。而要以名气、地位论，当属陕西乾陵的“无字碑”——这是女皇武则天的象征。二者都是大名鼎鼎，载入皇皇史册的。可是，我在这里却要抛开汉、唐的真品，说说名不见于经传的宋太宗赵光义的冒牌的“无字碑”。

宋太宗在征服了北汉之后，雄心勃勃，志得意满，大有一种“举世滔滔，舍我其谁”的超越感。这天，他来到太原城，游览了名闻遐迩的晋祠，见到这里竖有一座唐太宗的“贞观碑”，上面记叙着这位“贞观天子”的皇皇盛业，不禁心为之动，便仿效这种做法，也在晋祠立起一座“太平兴国碑”，借以歌功颂德，美化自己。

不过，两座碑的命运竟是截然不同：“贞观碑”被后人精心保护在宝翰亭中，一千三百多年来，那辞采斑斓的碑文、劲秀挺拔的字体与洒脱洗练的刻工交相辉映，光彩照人。而对这块宋碑，老百姓却偏偏不买账，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结果，只好作为一个变形的“无字碑”，被冷冷落落地放置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这使我想起了“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这句古话。



说到太原城的老百姓恨怨赵光义，这个话可就长了。

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太原称作晋阳，赵国曾一度把它作为都城。而后，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期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是依靠着雄踞晋阳而坐上了龙椅。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就是从这里起兵的。他们凭借着“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不到半年时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经过唐王朝的历次修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周围达四十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而太原守将李光弼，雄踞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五十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从北宋讨伐北汉的战争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太原城的战略地位。为了扑灭盘踞太原的北汉政权，太祖赵匡胤八年间两次出兵，都由于城池坚固，无功而返。又过了三年，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将太原城围困了五个月。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北汉主弃甲投降，这才夺取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古城。

当时，有人向宋太宗进言，太原一带有一条“龙脉”，不可不防。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当这条蟠龙的腹心。宋太宗是非常迷信的。他想，怪不得历史上这里出了那么多的开国皇帝，原来它有“龙城之兆”啊！为了铲除这条“龙脉”，摧毁一切可能出现的割据势力的温床，宋太宗于公元979年下诏削平系舟山，名为“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将“并州”这一太原的古称硬裁给了榆次县；彻底摧毁城池，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宫殿建筑及居民庐舍，老幼来不及逃出的，许多人被烧死在城中；还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没，使这座自古以来即为防御北方侵略势力的屏藩重镇毁于一旦。而后，在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唐明村修了一个小型的土城堡，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为的是钉住这里的“龙脉”。

面对晋阳故城的废墟，想到它旧日的赫赫声威，真是不胜铜驼荆棘之



感。那样一座坚如磐石的城池，于今除了一个破烂不堪的不知建于什么朝代的旧城门，其他任何遗迹也见不到了，破坏得十分彻底。宋太宗这一毁城祸众的暴行，伤透了当地民众的心，这个疙瘩已经结下一千多年了。

二

也许是先入为主吧，我对于雄猜狠鸷的宋太宗，也是一直没有好印象。小时候，看过一出名叫“贺后骂殿”的京戏，剧情是宋太祖赵匡胤猝死之后，其胞弟赵光义继承皇位，赵匡胤的皇后贺氏因丈夫死因不明，令长子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赫然震怒，想要把他斩掉，德昭又惊又恨，一头撞死。贺后于是带领次子德芳上朝骂殿。结局是，赵光义殿前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赵德芳为八贤王。看戏当时，除了为低回沉郁、悲凉慷慨、优美动听的二黄唱腔所陶醉之外，也觉得贺后骂得实在痛快，算是呼出了一口闷气。这出程派的名剧，是根据北宋神宗时僧人文莹《续湘山野录》“烛影斧声”之说演绎而来的。

关于宋太祖之死，《宋史》上的记载极为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九个字。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综合了《续湘山野录》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得比较详细。说太祖夜召晋王赵光义入内，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后来又看到太祖以柱斧戳地，大声对光义说：“好为之。”次晨太祖就死了。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太监王继恩召唤德芳，而王继恩却直接跑到晋王赵光义那里。晋王犹豫，不肯前行，王继恩催促说：“拖延久了，就会落到别人手里。”于是，晋王跟随他一起来到寝殿。宋皇后问道：“德芳来了吗？”王继恩说：“晋王到了。”宋皇后愕然，慌遽地对晋王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靠给官家了。”晋王哭着回答：“我们会共保富贵的，无须忧虑。”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如宋末遗民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载，太宗多次在太祖面前，盛称蜀国花蕊夫人费氏的才干，没过上一个月，蜀主就暴卒了。太祖感到诧异，当即找来花蕊夫人了解蜀主猝死的情况。发现这位费氏确实才情敏慧，便把她留在掖庭中陪侍，宠幸无比。这天，赶上太祖患病，光义于夜间入宫问候，适值太祖熟睡，呼之不应，遂乘机对费氏动手动脚，加以调戏。不料，太祖此时突然醒来，正巧目睹了这一场面，当即愤怒地以

柱斧砍地，斥责光义说：“你做的好事！”第二天晚上，太祖就死了。

从现存史料中得知，太祖死前两个月，都有御驾出行的记载，甚至远到洛阳，可见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死得实在是非常突然。最大的可能是死于他的胞弟赵光义的谋害。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如是说。

也正是由于赵光义是以篡弑手段夺取了皇位，唯恐后世非议，于是，便又伙同赵普编造出了一个“金匮之盟”，即杜太后临终前曾有太祖传位于光义的遗嘱。其真实性同样令人怀疑。尽管其时赵光义已做了开封府尹，实际上居于接班人的地位，但要继承大统，既无太祖的临终顾命，也没有正式储君的名分；而且以弟继兄，毕竟有乖常例，违反被历代王朝奉为金科玉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为了寻求合法继位的依据，只好抬出一个太后的“临终遗命”来加以缘饰。

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对此，官修的《宋史》同样是多所避讳，所记仍是九个字：“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封建王朝的史书向来是为尊者讳的。但在宋太宗统治权力干预不到的辽国，史官却记为“宋主匡胤殂，其弟炁（太宗名）自立”。一个“自”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有些敏感的史学家到底还是提出了问题：《宋史》中“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有的直斥太宗“褊急奸贪而攘天位”。可见，在后世的史学界，多数都是否定“金匮之盟”的真实性的。

《贺后骂殿》这出戏，正是针对赵光义这样一些齷齪的行径来编排的。作为一种舆情的真实而曲折的反映，它像《击鼓骂曹》《审潘洪》《斩黄袍》等剧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心声和愿望，但它与史实确有明显的出入。赵光义即位于公元976年，而贺后早在公元958年就已下世。人已仙逝，何来骂殿？赵德昭也并非死于赵光义窃位当时，而是在四年之后。尽管其事属于子虚乌有，但是，由于那激越慷慨、低回悲壮的唱词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底，再加上赵光义篡位后确实又“多行不义”，所以，即使知道戏文失真，感情上也还是转不过弯子，所谓“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也。

三

闲览有宋一代史籍，发现有关宋太宗遗事的记载有个显著的反差，就是官修史书许多方面或者失载，或者语焉不详，而所谓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的